天国旅行

蔡天新

凡是不能言说的,对之必须保持缄默。

——维特根斯坦

“没有一个地方让我喜欢,我就是这样的旅行者。”法国诗人亨利·米肖在《厄瓜多尔》(1929)里这样写到。他最早的两部诗集《大加拉巴涅之行》(1936)和《在神奇的地方》(1941),都是关于想象中的旅行的书。虽然我没有读到,可是我喜欢听他说:“我从遥远的地方为你们写作。”

很久以来,我几乎足不出户,但我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地聆听音乐。对我来说,这就像在天国旅行一样。人们在我面前,来来去去,却没有发觉。一段时间里,我感觉音乐是新婚的妻子,每时每刻,无微不至,出现在我的枕边、耳旁。而诗,则犹如过去的一位恋人,仅仅在某种特定的场景里,和我不期而遇。

在希腊神话里,阿波罗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他有九个姐妹,统称缪斯,音乐一词,大概来源于此吧。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谈道,“看过一个地方的植物,要看花了;就是说看过一个人,要看他的艺术了。”我想音乐一定是花中之花了。

我永远都记得1983年秋天的那个午后,在数学王国里遨游已久的我,突然听到了从一架破旧的收音机里传出的美妙动听的音乐。曲目有: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晴朗的一天》,门德尔松的无词歌《春之声》,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王》中的《波洛涅兹舞曲》和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里的《索尔维格之歌》。

这次邂逅真是太意外了,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它直接开启了我头脑中的另一扇大门。我无法用散文的语言来追忆。

在中国,伯牙和子期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一曲《高山流水》流传了数千年。还有一个更古老的传说,五千多年前,一位名叫“伏羲”的音乐家,他是人首蛇身,在母胎中孕育了12年,他弹奏的是一张50弦的琴,由于曲调过分悲伤,黄帝下令将其琴弦断去一半。

1991年深秋,我独自旅行到了天府之国。一天晚上,我在成都诗人欧阳江河家做客,他用巴赫的音乐招待我。巴赫向来以乐坛上的数学家著称,可是那晚却一反常态,偏偏以抒情诗人的面目出现,原来是擅长肖邦的吉奥格·索尔蒂在演奏。随后,主人拿出索尔蒂的几幅照片向我展示,这位匈牙利出生的英国钢琴家以指挥大师闻名于世。可以想见,欧阳当时的得意心情。

旅行是人类的普遍需要。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未必要见多识广,但他需要时常去天国旅行。

在天国旅行,和平常的旅行一样,也会有烦恼、忧愁,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生活在别处》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就像兰波的老师伊泽蒙巴德的妹妹们——那些著名的捉虱女人——俯向这位法国诗人,当他长时间漫游之后,便去她们那里寻求避难,她们为他洗澡,去掉他身上的污垢,除去他身上的虱子。”天国之旅,是享尽了自由、孤独和极乐的精神之旅。

于是,我终于按捺不住对世界的向往,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异国之旅。

我的身体所抵达的地域之广是我本人原先没有想象过的。正如挣钱对有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出门旅行对我来说无疑是拿手好戏。

欧阳江河后来做过《爱乐》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担任过中国对外演出总公司的艺术顾问并以此谋生,我们曾在北京的望京公寓、杭州西子湖畔的印象画廊、美国华盛顿的一套出租房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星级宾馆里再次相聚并聆听音乐。他收藏的唱片数量自然是越来越多,而我依然喜欢稍纵即逝的东西,并偶然享受到异国邂逅的快乐。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寻找向往的家宅

郑时龄

景观是一个广义的“空间和视觉总体”。最近读了建筑师钟律的《千里寻乡》一书,展现了她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的理念,基于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将建筑和景观空间提炼为“景感空间”。

景感者,得之心而寓之景也。“景观”与“景感”的差异在于人与空间环境的共生和互动,在于人的主动性,人与景观的关系由被动走向主动,走向和谐,进而创造世界。用心丈量空间的尺度,使景观上升为景感,使场地成为人们心仪的场所。

我觉得“景感空间”应该是诗化的空间,是有灵气的场所,是人人的景观,是公共的环境,是我们的行为,也是我们的梦想。这样的空间会塑造出特殊的人群和特殊的生活方式。

城市空间是我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也是我们塑造自身的空间,这样的城市空间会散发出诗情和画意,人们会想写诗,想歌唱,想画画,想抒发自己的感情。好比美国诗人惠特曼所向往的“我要写出物质的诗歌,因为我认为它们正是最有精神意义的诗歌……那时我才可以有我的灵魂的和永生的诗歌”。这些多彩的公共空间也是钟律作为建筑师参与创造,参与城市更新,参与空间修补,参与重建公共空间,参与重建滨水生态的诗歌。为实现完美的设计,建筑师钟律需要触摸城市的脉搏,领悟城市发展的历史,把握城市文脉,知晓城市规划、知晓市政设施,知晓交通系统,知晓自然和社会生态,知晓水文地质,知晓景观照明。从自然中提炼美,将绿色景观引入街道和社区,在城市和自然环境中创造人工的生态系统。在系统改造消极的城市空间中,讲述有故事的公共空间,采用化繁为简、精细绣花的手法,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城市空间的品质,提供高品质的设计和愉悦的环境,塑造人性化的场所,为城市空间注入活力,让城市空间获得新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城市的自我价值体系和特色。

《千里寻乡》,我们寻找的故乡,也是广义的家,是所有人都向往的家宅。其实寻遍千里,远方和故乡就在此地。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说:“因为家宅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它照亮了回忆与无法忆起之物的结合。在这个遥远的区域,记忆与想象互不分离。”

书在那儿

陆其国

曾有人问一位登山者:你为什么要去登山?在问者看来,登山既不能挣钱,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你的动力来自哪里。只见登山者用手指着远处的高山群峰,回答了六个字:因为山在那儿。山在那儿——这就是理由,也是支撑登山者义无反顾攀登的最大力量。

有一句话叫书山有路勤为径,意谓在读书学习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由登山说到书山,不由就让人联想到了阅读。当然,本文说的阅读仅指纸质书。原因无他,因为眼下人们的阅读习惯,更多的已被手机和网络霸屏,鲜有人还以捧读纸质书为乐事。但即使这样,钟情纸质书的读者毕竟不乏其人,这有每年隆重举办的书展和一些各种形式、不同年龄层读者参与的读书会活动为证。而牵线这些平台与读者的“媒介”,即是纸质书。作为这个读者群的一员,我想假如有人问我们何以如此钟情纸质书,我想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回答:因为——书在那儿。毕竟我们只闻开卷有益,而没有听说开“机”有益。

每餐珍菜蔬

齐铁偕 诗书画

正如直插云霄的山峰耸立在那里,因此激发出登山者的攀登热情一样,往往一本纸质书——尤其是经典名著出现在那里,同样也会让你欲罢不能。很多时候,有些书还具有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特性。比如那些有着独特标记的书或作家签名本即是如此。英国藏书家爱德华·纽顿在《聚书的乐趣》一书中写道:“赠送本或与名人有关的书之贵是无出其右的。要找寻理由并不难。任何上述的书都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第二本。”他还拿一位知名将军举例:后者离开英国时,身边带着未婚妻送他的一册知名诗人的诗集。将军在这本诗集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其中不少内容正是他对未婚妻的真情流露。纽顿写道,将军死后,“这本独一无二的、与名人有关的、饶有趣味的无价之宝被标价出售。第一个看到它的人买下了它,他以前从未买过好书,但他无法抗拒这本书的诱惑”。再如1946年夏天,时在美国的我国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回美国探亲的著名诗人艾略特,后者名作《荒原》的中文首译者正是陈梦家的妻子、知名翻译家赵萝蕤。几天后,艾略特见到赵萝蕤,他在自己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送她留念,还在前书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像这样的书,即因其“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除此之外,纸质书还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好多年前我曾踏足北京琉璃厂文化街,那里沿街开设的各类书店,扑面给人以一种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再如巴黎塞纳河左岸一溜摆开的琳琅满目的各式旧书摊,之所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无不由那些纸质书所映衬和折射。相信任何一位真诚的读者,置身这样的地方,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流连忘返:因为——书在那儿。

茶豆

曲令敏

我不叫它“眉豆”而叫“茶豆”,是怕一改口它就会沉落,消逝于多年来琐事骇落的灰烬,再也寻不见踪影。

茶豆儿,小时候叫惯的乳名,如同一把称手的耘锄,一下子就拂去了枯草烂叶,左一拨拉,右一拨拉,青绿的茶豆儿浮现,先是三片青瓦护着的根部,再是扭着劲儿伸向高处的藤,再是梗着脖子开向天空的串串白花、紫花,最后是三片一组层叠无数的叶子,羽毛一样拂过心灵……茶豆儿种在南坑边儿,那儿离水近,还有两棵细高的椿树,一棵树冠低矮的柳树,随便扯根绳子,来回攀几道儿,就够它们爬了。

茶豆子儿怎样下地,由于年代久远,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椿头菜碗口大的时候,一场小雨过后,奶奶就把挂在屋檐下的茶豆种够下来,点种在父亲整好的那溜虚土上。这些茶豆子可算是劫后余生,冬天烤火的时候,烧玉米、烧黄豆是孩子们常演不衰的节目。絮烦了,就搬个凳子去够那个烟布袋一样搐着口儿的种子袋儿,偷些白色、紫色、黧花的茶豆子儿,扒开红堂堂的火窝儿埋进去,不大一会儿,铿——,豆子儿炸开,几张小脸儿全是青灰,嘿嘿哈哈的笑声溅起来冲破屋瓦。

比着玉米和黄豆,茶豆子个儿虽大却有股腥味儿,也不好咬。说白了,烧茶豆是为了听那声响,就像过年放雷子。奶奶听见不对,赶着抢过种子袋去,免不了一顿虚张声势的呵斥。

茶豆儿恋秋,长长一个夏天差不多没人想起它们来。在记忆里活灵活现的就是包指甲花儿。茶豆叶光,大小正好裹住一个手指肚儿。黄昏时采一把指甲花儿,用细盐揉揉,放在一张麻叶儿上。吃过晚饭,搬个草墩儿或蒲团儿来到树底下,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月亮地儿里,按好一疙瘩指甲花儿,摘片茶豆叶儿裹严,用青麻批儿缠紧,一个一个把食指之外的八个手指全包好,等不了一个时辰,指甲就被染得紫红紫红,再多肥皂也洗不掉。

当然,种茶豆是为了吃茶豆板儿,春上种下三四埯茶豆儿,到秋来一天能摘一筛子。切丝儿焯焯,放上麻油、蒜泥儿凉拌,爽口又耐嚼。吃不及就晒上,过年时焖红烧肉,比现今都市里流行的罐装野菜,那味道好上岂止百倍千倍。

路漫漫其修远兮

佟瑞欣

成立于1953年9月4日,今天是上影演员剧团成立70周年纪念日。星光熠熠,艺脉绵延。我们以剧团成员的自述来纪念这70年波澜起伏的历史,并期冀未来。

——编者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今生没演够,来世再享受”“剧团每个演员的历史,就是上影演员剧团的历史”“剧团是我表演的土壤,培养了我,造就了我”……为庆祝上影演员剧团成立70周年录制《我和上影演员剧团》演员们如此感慨着。

赵丹、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等许多前辈演员们已经故去,但他们所成就的团魂,依然如灯塔一般,照耀着剧团一代又一代人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求索。

1953年成立的上影演员剧团经历了70年风雨,走过了光辉的历程,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剧团老团长张瑞芳曾殷切嘱托“即使中国电影的发展遇到再大的困难,演员剧团也不能散”。70年沧海桑田,如前辈所愿,上影演员剧团依然活跃在中国电影的广阔舞台上屹立不倒,以顽强的努力、对电影表演事业的挚诚塑造着一个个时代的银幕形象,以一部部作品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电影为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勋。1961年,上影演员剧团7位演员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与兄弟电影制片厂的共22位演员,被授予“新中国人民演员”,即“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称号。如今,我们在剧团成立70周年之际,拍摄《我和上影演员剧团》,不单单是追忆剧团历史,更是期冀未来。期待更多璀璨的新星能从剧团升起,希望他们的名字也能和众多前辈一样,书写在中国电影的苍穹之上。

上影演员剧团历经了10位剧团团长,他们是张望、金焰、白杨、张瑞芳、铁牛、向梅、吴鲁生、何麟、崔杰;2016年我受命担任上影演员剧团第十任团长。剧团团址从铜仁路到武定西路、瑞金一路、大木桥、武康路、虹桥路广播大厦。1953年9月4日,上影演员剧团正式成立。从电影《大路》的金焰、刘琼、张翼,到《马路天使》的赵丹、魏鹤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上海电影人铸就了上影演员剧团伟大的起点。上影演员剧团起初团址在南京西路铜仁路,经过七次搬迁,直至1982年迁入武康路395号。众多经典电影作品也从小楼里的排练厅走上大银幕,为全国观众带来艺术与美的享受。

2018年的金秋十月,在暌违15年后,上影演员剧团重新回到了位于武康路395号的这幢四层小白楼。梧桐树掩映的这幢小白楼,安静优雅,这里承载了无数上海电影人的记忆。当天恰逢剧团老团长张瑞芳诞辰100周年,她的半身铜像也在回迁的第一天正式落成,被安置在小院竹林中。剧团在院内新铺设了清水砖,上面刻着“上影演员剧团,1953—2018”的数字,记录着剧团的发展印记。

2019年至2022年剧团相继又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影演员剧团前辈赵丹、孙道临落成了铜像。我们修建了健身房、化妆室、摄影棚和录音棚,配置了商务车接送老演员。同时上影演员剧团专门请剧团的秦怡、王丹凤、黄宗英、牛犇、向梅、杨在葆、达式常、梁波罗、陈冲、张瑜、龚雪、郭凯敏、王诗槐、赵静、吴海燕、王景春、陈龙、唐嫣等几代演员留下手印和签名,镶嵌到挨着武康路的青石板小道上,这里已然成为一条上海电影的艺术长廊,也成为上海电影的新地标。

新征程吹响新号角,今年年初,由剧团几代演员主演,献礼剧团成立七十周年的影片《父亲在远方》业已杀青,即将奉献给广大观众。

我们为能将自己的电影艺术人生与赵丹、金焰、孙道临、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王丹凤、秦怡等上海电影前辈们有所关联而倍感荣耀,我们为能将个人的生命过程与上影演员剧团有所关联而感到无限幸福。在剧团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请剧团老中青电影人回到武康路团址共话《我和上影演员剧团》梳理上影演员剧团70年的光辉历程,上影演员剧团演员将不负使命,不忘初心,守护好上影演员剧团这个中国电影之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十日谈

我和上影演员剧团

牛犇和佟瑞欣团长回到了上影演员剧团的诞生地,重回旧里,这让牛犇感慨万千。

责编:吴南瑶 孙佳音